
November 2021

“Levi’s Paradox” and Its Solution: Giorgio Agamben’s Poetics of Witnessing

Yiqun Zho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Zhou, Yiqun. 2021. “Levi’s Paradox” and Its Solution: Giorgio Agamben’s Poetics of Witnessing.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1, (6): pp.139-147.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1/iss6/2>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莱维悖论”及其解决：阿甘本的见证诗学

周逸群

摘要：见证奥斯维辛面临着“莱维悖论”：无言者作为彻底的见证者，因触碰死亡而无法作证，幸存者作为奥斯维辛的例外，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伪见证者。阿甘本认为，无言者与幸存者皆无法独自承担见证，见证者应该被视为由二者相互“排除性纳入”而建筑的界阈，亦即一种“统一-差异”的断裂构造。由此，见证的不可能性与可能性彼此构成，为无言者见证的不可能作证的幸存者就是见证者，见证者是通过为见证的不可能作证而得以承担见证之责的人。与之无异，证词同样呈现为一种断裂构造，证词来自语言为非语言作证，来自语言对非语言的回应，证词是被语言作证的非语言。在阿甘本看来，这意味着证词的语言不再意指，因为被语言作证的非语言是声响已逝而意义未至的声音/死语言，证词的实质是声音/死语言。也正是作为声音/死语言的证词奠定了文学的可能性。文学在奥斯维辛之后若要表明其继续存在的正当性，它的语言必须是声音/死语言。

关键词：阿甘本； 见证； 莱维悖论； 界阈； 声音/死语言

作者简介：周逸群，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文艺社会学研究。通讯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500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241。电子邮箱：zhouyiqun0217@outlook.com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战后意大利文艺美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1CZW061]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Levi’s Paradox” and Its Solution: Giorgio Agamben’s Poetics of Witnessing

Abstract: Witnessing Auschwitz is confronted with “Levi’s paradox”: The speechless as a thorough witness cannot testify because of their death; and the survivor as an exception of Auschwitz, to some extent, is only a pseudo-witness. Agamben argues that neither the speechless nor the survivor can bear witness alone, and the witness should be seen as a threshold constructed by the mutual “exclusive inclusion” of the speechless and the survivor, that is, a fractured construction of “unity-difference.” As a result, the impossibility and possibility of witnessing constitute each other. The survivor who bears witness to the speechless’s impossibility of witnessing is the witness; the witness is the one who can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of witnessing through bearing witness to the impossibility of witnessing. In the same way, testimony also presents itself as a fractured construct, which comes from language that bears witness and responds to the non-language. Testimony is the non-language testified by language. For Agamben, this means that the language of testimony no longer signifies, because the non-language testified by language is the Voice/dead language, which is “no-longer” a voice and “not-yet” any meaning. The essence of testimony is Voice/dead language. It is also the testimony as Voice/dead language that establishe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ossibility of literature. If literature wants to justify its existence after Auschwitz, its language must be Voice/dead language.

Keywords: Giorgio Agamben; witnessing; Levi’s paradox; threshold; Voice/dead language

Author: Zhou Yiqun, is a Ph. D. candidate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areas cover the sociological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Addres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o. 500 Dongchuan Road, Minhang District, Shanghai 200241, China. Email: zhouyiqun0217@outlook.com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Youth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oundation (21CZW061).

无人在这见证作证
——保罗·策兰

奥斯维辛是西方社会现代性进程中的界标性事件,在奥斯维辛之后,黑格尔主张的作为世界精神在现实历史中合乎理性展开的普遍历史走向终结。诚如阿多诺所说,奥斯维辛是比自然灾害(第一自然)更为恐怖的社会灾害(第二自然),它“抽走了人的想象力,因为这种想象力从人的邪恶中引出了现实的地狱”(阿多诺,《否定辩证法》413)。因此在奥斯维辛之后,对其进行反思与批判便成为应有之义,可以说,任何理解我们时代的尝试都必须关注奥斯维辛,“过去”不会简单地过去,它筑造了我们今天思考和行动的可能性视域(Postone 99)。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绝非少数,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亦不例外。作为因阐发生命政治理论而声名烜赫的当代思想家,是阿甘本始终眷注奥斯维辛这一历史事实,奥斯维辛也构成了阿甘本理论反思的现实触动,乃至他围绕着奥斯维辛事件从多个维度进行诊断,对见证难题的分析就是其中一个声部。本文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在阿甘本的论述中,幸存者是否为奥斯维辛作证是否可能;倘若可能,幸存者又该如何见证;以及,文学能否承担起为奥斯维辛作证的伦理责任,以恰切的方式回应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的命题。

一、见证者的界阈

阿甘本首先调用他惯常使用的语文学手段对“见证/见证者”(witness)的词源进行了一番考订。他指出,“witness”在拉丁文中分别对应两个词语:其一是“testis”,为“testimony”(证词)的词源,指的是法律审判或诉讼中对立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第三方;其二是“superstes”,为“survivor”(幸存者,意大利文为“superstite”)的词源,指的是从始至终经历了整个事件因而能够作证(bear witness)之人。换言之,存在着两条见证的路径:第三方作证与幸存者作证。二者显然在法理层面上呈对峙之势,幸存者不可能是中立的第三方,他们卷入了事件,证词无法作为判决事实,违背法律所要求的客观性。针对见证奥斯维辛这一难题,阿甘本讨论的是后一种见证方式,辨析幸存者是否为奥斯维辛作证是否可能。

美籍犹太作家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曾在题为《作为文学灵感的大屠杀》的演讲中指控道,施害者在剥夺受害者生命、焚烧其尸体后仍试图第三次杀害受害者,蓄意抹除对受害者的记忆。掩盖受害者的死亡事实显然是出于政治考量的反伦理行径,幸存者有责任站在受害者一边,维护受难记忆并讲述他们的故事,“如果说希腊人创造了悲剧,罗马人创造了书信体,文艺复兴创造了十四行诗,那么我们的时代则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即见证文学。我们曾身为见证人,我们都感到不得不为未来作证”(威塞尔 170)。在威塞尔看来,见证通过记忆奥斯维辛而指涉未来,见证是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梁津。对于经历过奥斯维辛的幸存者而言,拒绝遗忘是他们的伦理责任,所有幸存者必须为奥斯维辛作证。然而从另一层面上说,威塞尔预设了自身见证行为的合法性,认为幸存者作为见证者是不证自明的。这便是阿甘本的问题切入点,阿甘本回到见证的逻辑起点,关注幸存者作证的限度。在这里,阿甘本提及了一名幸存者——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莱维身为奥斯维辛的亲历者,面对战后盛行的历史修正主义,毅然地承担起见证的责任。吊诡的是,与见证相伴随的是莱维始终对自身见证行为的合法性抱有怀疑。他说道:

我必须重申:我们,幸存者们,不是真正的证人。[……]我们幸存者是数量稀少且超越常态的少数群体:凭借着支吾搪塞,或能力,或运气,我们没有到达集中营的底层。而那些到达底层的人,那些目睹蛇发女怪戈尔戈(Gorgon)的人,无法回来讲述它的可怕,即使回来,也失去了讲述的勇气和能力,但他们是“穆斯林”,是被吞没者,是彻底的见证人,他们的证言有着普遍而重大的意义。他们是规则,而我们是例外。[……]我们只是在近处目睹了这些故事,并非亲身的经历。(莱维,《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83—84)

从莱维的自白可以看出,幸存者是奥斯维辛中的例外,他们没有触碰到奥斯维辛的底层,经历死亡这一奥斯维辛最正常的事件,所以奥斯维辛

的幸存者只是有限的见证者,或者说伪见证者(pseudo-witnesses),而那些触碰到底层的无言者(Muselmann^①)作为彻底的见证者没有且再也无法作证。阿甘本将为奥斯维辛作证的矛盾处境称为“莱维悖论”(Levi's paradox),利奥塔曾在《歧异》中讲述了相似的困境:“对毒气室‘真正地亲眼所见’,是一个人有权说毒气室存在并说服不信者的条件。然而,仍有必要证明毒气室被看到时是用来杀人的。要证明它是用来杀人的,唯一可接受的证据是有人死于毒气室。但是,如果某人死了,他就不能证明自己死于毒气室。”(Lyotard 3)甚至,有些学者主张奥斯维辛是“没有见证者的事件”(event without witnesses),见证奥斯维辛面临着双重的不可能:首先,从内部见证奥斯维辛是不可能的,彻底的见证者是已然死亡的见证者,“无人可以在死亡的内部作证,声音无法讲述声音的消失”(Agamben, *Remnants* 35);其次,从外部见证奥斯维辛也是不可能的,外部的见证只是有限的见证,外部被排除在事件之外。

阿甘本拒绝作此理解,转而将见证者的可靠性问题置换为见证者自身的结构问题,批判这类言论忽视了内部与外部之间的“无区分地带”(a zone of indistinction),即“界阈”(threshold)。根据阿甘本的界定,界阈不是与“界限”(limit)有关的别种事物,而是“界限”(limit)本身的经验,进一步说,界阈并不指向与已有空间无关的另一个空间,相反,它是“通道”(passage),已有空间既借此接触到“外在”(outside),“外在”在外又仍属于已有空间。究其原因则在于,界阈的运作逻辑是“排除性纳入”(exclusive inclusion)逻辑,外部通过排除被纳入内部之中。故而,界阈可以被“出离-内属”(ecstasy-belonging)的矛盾修辞法所定义,它是区别于“是内/是外”的“内在于一种外在的存在”(being-within an outside)的“纯粹的外在性”(pure exteriority)(Agamben, *The Coming Community* 66-67)。总之,界阈是一个“无法区分的地带,其中内与外并非相互排除,而是相互无法界定”(阿甘本,《例外状态》32)。

回到见证者问题。阿甘本认为,幸存者能够以权威者(auctor)之名替无言者承担见证之责。所谓权威者是指“扩充(aumenta)、增加或完善另一个人的行为(或法律处境)的人”(阿甘本,《例

外状态》123),他使得欠缺能力之人行行为有效并与其共同完成法律行为。换言之,权威者不是独立的法律主体,相反,他总是关涉另一个需要被帮助的行为者,二者协力才能授予某个行为法律效力。在阿甘本看来,若要见证奥斯维辛,无言者与幸存者的关系也应当如此。见证者既无法归类为无言者,也无法归类为幸存者,见证者的实质是无言者与幸存者依靠相互“排除性纳入”而建筑的界阈,即由无言者与幸存者组成的“统一-差异”(unity-difference)的断裂构造。这意味着,见证者作为“纯粹的外在性”内在于无言者与幸存者,无言者与幸存者在见证者的界阈中亦无法区分。具体来说,一方面,幸存者承担见证的前提是回应无言者见证的不可能性,为无言者“遗失的证词”(missing testimony)作证。见证的不可能是一种幽灵般的在场,它奠定了见证的可能性基础;另一方面,无言者见证的不可能借助幸存者的作证进入可能性之中。幸存者证明了无言者的存在,证明了无言者是在根本上无法作证的彻底的见证者,在某种意义上,无言者经由幸存者的作证而幸存。由此,见证的不可能性与可能性彼此构成,幸存者凭借为无言者见证的不可能作证而承担见证,为无言者见证的不可能作证的幸存者就是见证者。诚如杰西卡·怀特(Jessica Whyte)所言:“从莱维试图替那些无言者言说中,阿甘本形成了一种关于见证的观点,即见证者总是针对言说的不可能而言说。”(Murray and Jessica, eds. 122)见证者必须“以作证的不可能性的名义来作证”(Remnants 34),见证者是通过为见证的不可能作证而得以承担见证之责的人。

在莱维过世一年后,兹齐斯拉夫·莱恩(Zdzislaw Ryn)与斯坦斯拉夫·克洛津斯基(Stanslaw Klodzinski)出版了第一本致力于研究“Muselmann”现象的著作《在生与死的边界上:对集中营“Muselmann”现象的研究》,其中的一章“我曾是一名Muselmann”似乎推翻了“莱维悖论”。此章收录了十篇来自无言者的证词,对于幸存的无言者而言,无言者与幸存者不再是分裂的两个个体。然而阿甘本认为,幸存的无言者“不仅没有与莱维悖论相抵触,反而彻底证实了它”(Remnants 165),幸存的无言者不应该被视为无言者与幸存者合二为一并成为彻底的见证者,而应该被视为无言者能够幸存,幸存者也能够

为自身曾成为的无言者作证。幸存者幸存自无言者,无言者幸存自幸存者,二者共同构成了见证者。甚或说,每一个见证者都是幸存的无言者。

二、作为声音/死语言的证词

恰如保罗·德曼(Paul de Man)所说,“死亡是一个错位的名字,它表达了一种语言的困境”(De Man 81),战后,部分参与暴行的施害者拒绝认证词所再现的无言者经历的真实性,一般来说,这也是证词面临的最为普遍的指控,奥斯维辛抵制被述说。然而,阿甘本却悬置该问题,凯瑟琳·米尔斯(Catherine Mills)补充道,固然莱维悖论“引发了一些关于经历真实性的认识论问题,但阿甘本很大程度上将这些问题置于一旁,聚焦于经历与经历可被说出的部分之间,即事实与语言之间的明显空白的伦理意涵”(Mills 88),此处的事实指的是无言者的经历,语言指的是证词。在阿甘本看来,重要的不是对无言者经历的再现是否真实所引发的认识论问题,而是证词与其试图见证的无言者的经历之间的空白所具有的伦理意义。更为准确地说,由于无言者不能回来讲述自身的死亡,为其作证的证词中存在着一块本质的空白,因此无言者的经历与证词之间的空白实则表现为证词之内的空白,阿甘本讨论的便是证词中的空白的伦理意义。

思考证词需要审视这一空白,因为它动摇了证词的可靠性。不同于产生记述(constative)话语的历史思维,记述话语陈述事实,因而可以作出真假判断,证词是一种言语行为,是具有述行(performative)功能的以言行事。比如,雅克·德里达在《见证的诗学与政治学》一文中指出,见证是一种独异性(singularity)经验,见证永远是第一视角的“我作证”(I bear witness),而“我作证”不是“我证明”(I prove),而是“我发誓说实话”(I promise you to tell the truth)(Derrida 75-76)。沿着阿甘本的逻辑不难推断,奥斯维辛必然导致言语行为失效,在正常情况下,言说者通过以言行事的方式确保自身言语的效力与完满,但对奥斯维辛而言,“证词的价值在根本上取决于它所缺失的东西,证词的中心包含了某种无法被作证并剥夺幸存者权威的东西”(Remnants 34)。正是在此层面上,雅克·德里达以下的观点是恰当的:

“当证词似乎被确证,然后成为可证明的理论真理、法律诉讼或报告的一部分、证据的实证甚至一件证据时,它就有可能失去其价值、意义或作为证词的地位。”(Derrida 68)那么,何谓内部存有空白的证词?在这里,阿甘本围绕着非语言(non-language)与语言,亦即语言的不可能性与可能性之关系展开论述。

莱维在《休战》中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位没有姓名(只有前臂上烙印着囚犯号码)因而被他们起名为赫比纳克(Hurbinek)的孩子,他不会说话,因为没有人曾教他学习语言。在一个夜晚,赫比纳克突然不断地重复一个单词,它被模糊地记为“mass-klo”或“matisklo”。尽管奥斯维辛汇集了讲欧洲所有语言的人,但依然无人听懂赫比纳克的词语。最终,赫比纳克无名地死于1945年3月初,“自由但未获救赎,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他只通过我的这些文字而作证”(Levi, *La Tregua* 228)。阿甘本认为,赫比纳克所持的语言是一种黑暗而残缺的语言,可称之为非语言,根据莱兰·德拉·杜兰特耶(Leland de la Durantaye)的判断,非语言是一种“有声响但是无意义的语言,一种语义语域似乎空洞而缺失的语言,一种似乎是而非语言的言语”(De la Durantaye 261)。需要强调的是,“mass-klo”或“matisklo”不是赫比纳克的非语言,而是被莱维语言作证的非语言,这恰恰点破了证词的奥秘:虽然赫比纳克因没有语言而无法作证,非语言是不确定且无意义的,但是赫比纳克的非语言没有湮灭在历史深处,依仗莱维语言的作证而得以留存,升格为证词。由是,我们能够看到证词内部的褶皱:证词必须通过语言道出,而“被作证之物不是语言或文字,它只能是无人见证过的东西。这是来自空白的声响,是孤独者言说的非语言,是语言回应的非语言,是诞生语言的非语言”(Remnants 38)。

在阿甘本看来,证词与见证者的结构相同,它既不是无言者的非语言(语言的不可能性),也不是幸存者的语言(语言的可能性),而是由非语言与语言相互排除性纳入而构造的界阈。证词发生于,无言者驱使幸存者言说,而幸存者承受着用自身语言言说的不可能,语言的不可能性与可能性由此进入的一个无区分地带。在此空间中,语言的不可能性与可能性相互作用:一方面,语言的

不可能性为语言的可能性奠定了基础,语言若要承担见证必须回应语言的不可能性,为非语言作证;另一方面,依靠语言回应语言的不可能性,非语言进入了语言的领域,语言的不可能性从而获得可能性。证词便来自语言为非语言作证,来自语言对非语言的回应。为了构成证词,语言应当借助为非语言作证而将其拉入语言之中,如此一来,语言赋予无意义的非语言以意义,被语言作证的非语言呈现出一种悖论式的无意义之意义。证词即是被语言作证的非语言。阿甘本认为,对于证词而言,无意义之意义具体表现为“证词的语言是一种不再意指(*signifies*)的语言,它通过无所指(*in not signifying*)进入没有语言的状态,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达到另一种无意义(*insignificance*)——它是完全见证的语言,是按定义无法作证之人的语言”(*Remnants* 39)。可见,为奥斯维辛作证的证词必然包含着语言的不可能性,证词就建筑于空白之上。这也是证词中的空白的伦理意义。

总的来说,阿甘本对为奥斯维辛作证持辩证态度,提请人们对奥斯维辛不可言说的观点要格外谨慎。如果这指的是见证者面对奥斯维辛的独特性时,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必须经受语言的不可能的考验,那么这是对的;但是如果将奥斯维辛视为一种与语言分离的绝对现实,打破了构成证词的语言的不可能性与可能性之关系,则会在无意识间与纳粹暗通款曲,重复纳粹对于奥斯维辛闭口不提与否认的姿态(*Remnants* 157)。

此外,我们可以基于阿甘本在语言哲学论域所探讨的死语言(*dead language*)现象对证词问题展开进一步分析。死语言在西方文化史的初次登场是在奥古斯丁的《论三位一体》中,奥古斯丁曾在书中提问:当人们听到一个未知声音会作何反应?他随即断言,人们会习惯性地追问这个声音所代表的词语的意义,前提是他们知道自己听到的声音不是“空洞的声响”(*empty voice*)或“纯粹的声响”(*mere sound*)。阿甘本认为,奥古斯丁所说的声音便是死语言,死语言是一种关于声音的经验,“仅仅思考声音本身”(阿甘本,《语言与死亡》71)。并且,他的这番自问自答凭借厘清声响、声音^②与语言的逻辑关系阐明了声音的概念内涵——声音不再是声响,也还未具有意义而成为语言,它只是没有意义给予回应的意指的纯粹

意向(*pure intention to signify*),仅仅展示意义之存在。所以,声音是一种关系性的否定性存在,构造于与声响、语言的关联之中。更确切地说,声音可视为由声响和语言相互排除性纳入而形成的界限。排除性纳入的过程既是声响死亡的过程,又是语言死亡的过程,前者表现为声响被移除,后者表现为意义被悬置,而声音就是“不再存在”(*no-longer*)的声响和“尚未到来”(*not-yet*)的意义接合之处,在此,声响和语言相互无法界定。

那么,声响、声音与语言之间的关联是如何构建的?字母(*the letter*)作为声音的介质发挥着结构性作用。阿甘本说道,“只有在死亡之际,动物性的声响才注定要作为意指的纯粹意向于字母中进入意指语言;也只有在死亡之际,清晰的语言才能返回它起源的声音模糊的子宫中”(*Agamben, The End of The Poem* 71),即声响之中。阿甘本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字母是对声响的描述,使声响上升为意指的纯粹意向,同时也是对语言的呈现,在语言下沉为声响的瞬间将其捕捉,二者在声音的界国内彼此关涉。最终,声音依靠字母的摹写从声响中浮现,成为意指的纯粹意向,进入意指语言。也正因为这样,阿甘本主张“字母不仅仅是符号,亦是声音的要素[……]它给予声音意指性和可理解性”(*Agamben, What is Philosophy* 17)。

循此便可明了证词的语言为何不再意指。如前所述,非语言是无意义的声响,经由语言的作证而成为证词。在阿甘本看来,该过程是声响向声音的转化,证词的实质是声响已逝而意义未至的声音/死语言。

三、语言的沉默：文学作为见证

阿多诺曾对奥斯维辛作出一个著名论断——“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Adorno, Prisms* 34),“奥斯维辛之后”甚至成为命题,如禁令一般横亘在前,引起阿多诺的同时代人与后学们持续不断地争论和非议,以至于阿多诺不得不在生前数次对这句话进行解释并多番修改其表达。其中,阿多诺《介入》一文的回应就较为清晰:

文学必须抵制这一判决,换言之,文学在奥斯维辛之后的存在没有屈服于犬

儒主义。矛盾的是文学自身的处境,而不仅仅是人们如何对它作出反应。大量真实的苦难不允许被遗忘;帕斯卡尔的神学格言“禁止睡眠”应该被世俗化。但是,这种苦难,即黑格尔所谓的苦恼意识,在禁止艺术存在的同时也要求着艺术的继续存在;苦难几乎不可能从其他任何地方,找到它自己的声音,获得一种没有被立刻背叛的安慰。(Adorno, *Notes* 88)

阿多诺敏锐地察觉到文学在奥斯维辛之后的吊诡处境,奥斯维辛彻底摧毁了文学旧有的基础,欢快的文学不再可能,与此同时,苦难需要被书写,文学负有无可推诿的伦理责任,这要求文学必须找寻新的表现形式展现苦难。由此出发,阿多诺提供了一种判断文学能否承担伦理责任的标准。当然,阿多诺的标准绝非不刊之论,赵勇指出,阿多诺反复论述“奥斯维辛之后”命题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呈现问题,“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否野蛮、艺术是否可能的问题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阿多诺形成了如此看待文学艺术问题的视角,进而逼迫人们在这样的问题面前注目沉思”(赵勇 149),阿甘本即是其中一位覃思该命题的后学。那么对阿甘本来说,何种文学能够承担起为奥斯维辛作证的责任?阿甘本的回答是沉默的文学。

自20世纪以来,文学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变化是,文学从未像当时那般被沉默吸引。可是,沉默是怎么产生的?论及沉默自然绕不开语言,事实上,至少存在两种语言与沉默的关系,这也折射出两种不同的文学创作观念:其一,以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等人为代表,认为在奥斯维辛之后,“我们的语言已经失败,艺术既不能阻止野蛮势力,又不能表现说不出口的经验”(斯坦纳 159),因此只能疏离语言,没入沉默之中,走向比邻黑夜的自杀性修辞。在他们看来,沉默是语言的空无或缺席,语言通过言说去暗示沉默,沉默生成后又反身否定语言。在这一层面上,语言与沉默呈现为一种悖论性关系,沉默是语言之外的另一套语言,沉默并不意味着“和说分离,而是将沉默变成一种说”(布朗肖 76),保持沉默亦是在言说。其二,沉默源自语言本身的不可言说,阿甘本

便持这一论点。在阿甘本那里,语言不可言说的肇因在于词语沉沦为声音/死语言,其背后的意指关系被消解,变成展示意义之存在的纯粹意向。随着词语被移除声响又未获意义,语言就变得无法理解、不可言说,从而进入沉默之中,正如阿多诺所论:“远离所有意义的语言是不可言说的语言。”(Adorno, *Aesthetic Theory* 79)在这一层面上,语言与沉默呈现为一种同构性关系,沉默“不是简单的话语的悬置,而是词语本身的沉默,是词语变得可见”(Agamben, *Idea of Prose* 113)。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发现,为奥斯维辛作证的小说可以归约出一个“定律”,即“小说越接近直接作证,越接近大规模的‘共同体的毁灭’,它们的文体和叙事就变得越复杂、越精妙”(米勒 217),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一“定律”的适用范围稍稍扩大,不仅对小说有效,而且符合所有试图展现苦难的文学艺术。在奥斯维辛之后,传统的文学书写已然失效,它们无法承担起见证的责任,文学必须涤秽布新,另辟蹊径为奥斯维辛作证,这也致使文学表达变得愈加复杂。对阿甘本而言,展现苦难的文学之复杂性体现在它的语言是沉默的死语言,是通过字母对声响进行摹写的声音。策兰后期的诗歌就是其中代表。

简略地说,策兰的诗歌可以分为早期和晚期,尽管死亡和恐怖始终是策兰诗歌的主题,但是策兰的写作方式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策兰“诗中原有的音乐性和抗议主题消失了,其完美的形式结构似乎也‘破裂’了。词语和诗节日趋破碎、浓缩,一些隐喻也像密码一样难以破译”,策兰后期“已进入语言的黑暗内部和一种巨大的荒谬感中写作”(王家新 4—5)。阿多诺将策兰后期的诗歌称为秘奥诗(hermetic poetry),认为彼时策兰的诗歌“渗透着无法去体验和升华苦难的艺术羞愧感。策兰的诗歌试图通过沉默言说最极端的恐怖。它的真理性内容本身便具有了一种否定性。它们模仿一种人类无助语言之下的语言,亦即所有有机语言之下的语言:这是石头和星辰的死的语言”(Adorno, *Aesthetic Theory* 322)。阿多诺准确地把握住策兰后期诗歌的重要特征,对于策兰来说,语言受到奥斯维辛的污染而被蛀空,甚至堕落为暴行的帮凶。在奥斯维辛之后,语言不再可能是有机、鲜活的,这只会导致作品变得轻佻、虚伪,语言必须走向无机,成为一种枯槁冷涩、死气沉沉的

语言。

阿甘本显然同意阿多诺对策兰后期诗歌语言的判断,他讲述了一个饶有意味的故事:莱维身兼作家与化学家双重身份,这也决定了莱维不是追求隐晦表达的作家,但他却被策兰的诗歌吸引,认为不同于那些因无视读者或缺乏表达能力而文字晦涩的作家,策兰诗歌的隐晦性恰恰是由他依托对语言的出色运作而生成的某种黑暗诱发的。在策兰诗歌中,难以晓白的黑暗随着诗节的展开一行行地滋长,一直累积至诗歌终结处词不达意的含混呓语,它像是将死之人的喘息,让人如坠云雾而又怖惧不已。在莱维看来,策兰一方面通过含混呓语表现黑暗,黑暗正是策兰的诗歌希望传达的讯息,另一方面又使其不能被彻底昭示,隐匿在由含混呓语所制造的“背景杂音”之中,是需要倾听并理解的秘密词语。事实上,这种黑暗“不是交流,也不是一种语言,或者最多只是一种黑暗、残缺的语言,准确地说,是将死之人的语言,是孤寂的语言,正如我们所有人在将死之际会说的语言一样”(Remnants 37)。基于此,阿甘本断定,莱维之所以被策兰的诗歌吸引,是因为他在策兰诗歌的“背景杂音”中辨认出的“黑暗、残缺的语言”与他多年前在奥斯维辛从赫比纳克那听到的声响相同。

如果再结合阿甘本在《诗歌的终结》中对另一位意大利诗人帕斯柯利(Pascoli)作出的精要分析,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策兰的诗歌。阿甘本提醒道,帕斯柯利始终有着用死语言创作诗歌的渴望,刻意使用读者不认识的词语,试图掩盖并暗化诗歌语言的含义。譬如帕斯柯利的这首诗:“Mong, Mosach, Thubal, Aneg, Ageg, Assur, Pothim, Cephara, Alan, to me!”(*The End of The Poem* 71)这些拉丁词语无法翻译甚至是不可理解的(以致英译者在英译转化的过程中原封不动地予以保留),它们表现出一种可见的沉默,当第一句清晰的语言被道出,也到了诗歌终结的时刻。原因就在于,这些词语是借助字母呈现的声音/死语言,它们既被移除了声响而又意义延宕,“代表着语言脱离了语义维度,返回到意指的纯粹意向的原始领域(不是纯粹的声响,而是声音本身的语言和思想)”(*The End of The Poem* 67)。对阿甘本来说,无论是莱维记录的“mass-klo”或“matisklo”还是帕斯柯利的诗歌,策兰后期的诗歌

与二者拥有着相似的艺术特质——它们都是“对字母的体验”(73),是通过字母对声响进行摹写的声音/死语言。换言之,策兰使用的那些怪诞抽象、艰深晦涩、不堪卒读的语言,究其本质是依靠字母摹写声响的声音/死语言,策兰后期的诗歌所显露的沉默也源于此,它们是词语本身的沉默。面对奥斯维辛的死亡现实,诗歌中的哭声只能掩盖、美化现实中的哭声,于是策兰以主动的姿态选择肢解语言,用沉默回应非人道行为。沉默不仅不是对诗歌的破坏,反而赋予诗歌更强的表现力,是诗歌逻辑的自然展开,因为“诗人的语言总是一种死语言,奇怪的是,死语言被用来赋予思想更伟大的生命”(62)。

虽然阿多诺的“奥斯维辛之后”命题引起了巨大争议乃至误解,但是它实际上清晰地表现出文学在奥斯维辛之后所面临的困境:见证奥斯维辛的文学是否可能?阿甘本接过阿多诺的尖锐问题并给出了肯定回答,为文学在奥斯维辛之后如何获得正当性提供了一种应对之法:“无论是诗歌或歌唱,都无法通过介入来拯救证词的不可能性;相反,如果有什么的话,是证词奠定了诗歌的可能性。”(*Remnants* 36)在阿甘本看来,证词从根本上拒绝审美化,证词的审美化是从证词的不可能性中汲取审美可能性,而文学若要承担见证的伦理责任,为继续存在的正当性辩护,它应该是由证词写成的。即是说,文学若要为奥斯维辛作证,它的语言应该是声音/死语言。很明显,声音/死语言构筑了阿甘本认识文学的基本视域,也是他判定文学能否为奥斯维辛作证的基本尺度。需要指出的是,从另一层面上看,这恰恰反映出始终存在于阿甘本学说中的“类比”逻辑,即保罗·帕顿(Paul Patton)所指摘的“概念本质主义”(Calarco and Steven 218)。我们可以参考拉克劳(Ernesto Laclau)对于阿甘本的批评,阿甘本“过快地从确立一个术语、概念以及体制的谱系跳跃到确定它在当代语境下的实际运作,可以说,起源具有一种秘密的优先地位,能够规定它的后续发展”(11)。这一舛讹在阿甘本的见证诗学中则表现为:阿甘本运用谱系学方法追溯了声音在奥古斯丁思想中的要义,随即将其抽象化为非历史性的结构视角,在某种意义上,阿甘本是基于声音的概念内涵而有选择地解读策兰等人的作品,并最终给出文学若要承担见证理当奉行的圭臬。应该

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正是通过阿甘本的疏通,他们的写作才获取了相似的艺术特质。

结 语

如何评价阿甘本关于见证诗学的观点,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认知:

其一,在反思奥斯维辛事件的范畴,欧美学术界在战后对于如何理解奥斯维辛提出了诸多看法,阿甘本则从生命政治理论的角度澄清其内在机理。在阿甘本看来,奥斯维辛作为例外状态是生命政治的否定性逻辑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生命政治发展到极端的必然结果,而奥斯维辛并非孤例,恰恰相反,例外状态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营”(camp)是一个“当例外状态开始变成常规时就会被打开的空间”(阿甘本,《神圣人》226)。也就是说,随着例外状态被视为现代社会治理手段的安全典范,“营”成为内嵌于现代社会的常规空间,是“我们仍然生活其内的政治空间的隐秘矩阵和约法”(223)。在这样的背景下,见证便具有某种普适性的伦理意义,而不仅仅拘囿于忖量奥斯维辛事件。生命政治试图使其生产的赤裸生命(bare life)走向彻底的无言,而见证者用他的每一句证词抵抗着对幸存者与无言者的孤立。在这一层面,见证的伦理意义在于无言者通过幸存者的见证而幸存,不至于淹没在官方档案或浩渺历史之中。

其二,在文学的范畴,阿甘本为文学继续存在的正当性辩护,标记出一条文学承担见证之伦理责任的可能路径。阿多诺的“奥斯维辛之后”命题如幽灵一般始终质询着战后文学,阿甘本则接续阿多诺的思考并给出衡量文学的标准:文学若要为奥斯维辛作证,必须由声音/死语言构成,文学的真正语言是声音/死语言。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阿甘本承继了阿多诺对自律艺术的认识。如果说在阿多诺那里,艺术辩证地兼具自律性与社会性,其中艺术自律是艺术介入社会的前提,艺术只有保持自律、拒绝介入社会,才能发挥批判社会的功能,艺术的社会功能即是它们的无功能性(functionlessness),艺术本质上是一种“无言的雄辩”(eloquent with wordless gesture),那么对阿甘本而言,由于声音/死语言是展示意义之存在的纯粹意向,它指向意义但意义永远处于延宕状态,所

以由声音/死语言构成的文学获得了一种悖论品格:文学只有奠基于意义的空白之上才能承担见证,意义的空白便是文学的意义所在。

注释[Notes]

- ① “Muselmann”是奥斯维辛等集中营中的行话,被用来形容一些“活死人”(the living dead),即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不再有任何反应的行尸走肉。阿甘本认为,对于“Muselmann”这一称呼最合理的解释来自它的阿拉伯语的字面意思:“无条件臣服上帝意志之人。”他们是绝对的宿命论者,丧失自身的意志或意识。(Agamben 45)
- ② 在《语言与死亡》的意大利初版中,声响对应的原文是“voce”或“suono”,声音对应的原文是“Voce”或“la voce”,英译者通常将前者译为“voice”或“sound”,后者译为“Voice”或“the voice”。二者区别在于,声响是动物性的,声音是属人的,虽然声响通过发声器官而发出,它可以指向发声的个体,但是它不能指向话语情境,不能指向意义。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Adorno, Theodor Wiesengrund. *Aesthetic Theory*. Eds. Gretel Adorno and Rolf Tiedemann. Trans. Robert Hullot-Kentor.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2.
- :《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
- [---.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Wang Fengca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
- . *Notes to Literature*. Vol. 2. Ed. Rolf Tiedemann. Trans. Shierry Weber Nichol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 . *Prisms*. Trans. Samuel and Shierry Weber.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7.
- 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
- [Agamben, Giorgio.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 Wu Guanjun.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2016.]
- . *Idea of Prose*. Trans. Michael Sullivan and Sam Whitsitt.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 :《语言与死亡:否定之地》,张羽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 [---. *Language and Death: The Place of Negativity*. Trans. Zhang Yujia.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9.]

- . *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 Trans. Daniel Heller-Roazen. New York: Zone Books, 1999.
- : 《例外状态》, 薛熙平译。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5年。
- [---. *State of Exception*. Trans. Xue Xiping. Xi'an: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2015.]
- . *The Coming Community*. Trans. Michael Hardt.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 . *The End of the Poem: Studies in Poetics*. Trans. Daniel Heller-Roaz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 *What Is Philosophy*. Trans. Lorenzo Chies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 莫里斯·布朗肖: 《灾异的书写》, 魏舒译, 吴博校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
- [Blanchot, Maurice. *The Writing of the Disaster*. Trans. Wei Shu and Wu Bo.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 Calarco, Matthew, and Steven DeCaroli, eds. *Giorgio Agamben: Sovereignty and Lif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De la Durantaye, Leland. *Giorgio Agambe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De Man, Paul. *The Rhetoric of Romantic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 Derrida, Jacques.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Witnessing." *Sovereignities in Question: The Poetics of Paul Celan*. Eds. Thomas Dutoit and Outi Pasanen.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5. 65-96.
- 普里莫·莱维: 《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 杨晨光译。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3年。
- [Levi, Primo. *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 Trans. Yang Chenguang.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 . "La Tregua." *Opere*. Vol. 1. Torino: Giulio Einaudi, 1987. 213-423.
- Lyotard, Jean-François. *The Differend: Phrases in Dispute*. Trans. Georges Van Den Abbeel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
- J. 希利斯·米勒: 《共同体的焚毁: 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 陈旭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
- [Miller, J. Hillis. *The Conflagration of Community: Fiction before and after Auschwitz*. Trans. Chen Xu.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9.]
- Mills, Catherine. *The Philosophy of Agamben*.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 Murray, Alex, and Jessica Whyte, eds. *The Agamben Dictiona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 Postone, Moishe. "The Holocaust and the Trajec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tastrophe and Meaning: The Holocaust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51-117.
- 乔治·斯坦纳: 《语言与沉默: 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 李小均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
- [Steiner, George. *Language and Silence: Essays o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the Inhuman*. Trans. Li Xiaoju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 王家新: 《从黑暗中递过来的灯》, 《保罗·策兰诗选》, 王家新、芮虎译。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1-11。
- [Wang, Jiaxin. "A Light Passed from Darkness." *Selected Poems and Essays of Paul Celan*. Trans. Wang Jiaxin and Rui Hu.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2. 1-11.]
- 埃利·威塞尔: 《作为文学灵感的大屠杀》, 吕鹤颖编译, 《当代文坛》2(2018): 168-175。
- [Wiesel, Elie. "The Holocaust as Literary Inspiration." Ed. and trans. Lü Hey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2* (2018): 168-175.]
- 赵勇: 《法兰克福学派内外: 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
- [Zhao, Yong. *In and outside the Frankfurt School: Intellectuals and Popular Cultur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责任编辑: 王嘉军)